

## 文艺评论

## 地域风景、乡土情感与人类共同体自觉

□傅修海

因此,当我们内心平静,视野开阔而对大一统的抒情洪流能够脱敏的时候,地方群落诗歌群体的抒情路径、精神生态和风貌展现,就往往会让人眼前一亮,感到新奇、惊喜。

地方风景、地方路径的讨论,目前已成为中国文学经验总体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和角度。地方路径和整体历史进程的关系,地方元素、地方经验、地域生活、地方情感,都是令人倍感振奋的话题。作为一簇簇鲜活的群落生活体验,如何参与国家、民族和文化的整体历史进程,这的确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一定意义上,这也就是从对共名“我们”的关注,转移到具名的“我”的关注;从多元的集合的、象征性的“大我”的关注,到对一个一个小群体、对世俗性的“我们”的关注,进而再到一个一个具体的、日常的“我”的关注,或者说,是对日常的“自己”与“咱们”的关注与打量。从发现远方到发现身旁,从发现彼处到思量此处,从彼岸的地方将眼光收回到此在,甚至缩回到内心,甚至再次收缩到、沉淀到无意识的深处。这大致是中国诗歌在整个一百年来的基本变化。

我们从对世界的焦虑、对世界的发现、对世界的张望,从对彼岸的思索、对彼岸的向往,对彼岸的畅想,开始逐渐回到对民族、对国家、对地域、对乡土的再次打开,重新发现、重新扎根在生我养我的这一小块乡土。从本土本土的关注,从脚下具体的两足之下、头顶周围的发现,来确定自己的远和近、大和小、抽象和具体。在烟火气的围绕下,我们开始在日常生活的沉静中,在琐碎的或者不琐碎的目光下、声音里,去组织自己的情感,去拼贴生活的日常,去打量情感的存在。这一种变化,与其说是当代诗人的变化,不如说当下诗思的变化。

一言以蔽之,诗不过就是“有所思”。从《诗经》开始,哪怕从时间更早的一些民歌谣谚、上古民歌开始,也都是有所思。没有思,就没有诗。海德格尔的“诗—语—思”的脉络,准确而言,不过是哲学家对诗思的关系逆推与思维模型复盘。无所思的胡言乱语,直接跳跃而来的诗,那一定是无病呻吟。有所思,为什么有所思,无非就是有所失,心存怅惘。一定程度上,得也是一种失。患得

患失,恍兮惚兮,一体两面而已。

有所思的诗一定是及物的,其旨意无非两端:或推己,或及人。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终归有所思。其间也许是洞见,也许是茫然。基于此,地方路径的重启、照亮与聚焦,就是一次诗歌史的有所思的模态转折。正是在这种模态转变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目光在收缩、在内转。这种诗性目光的变化,呈现出来的情感症候,就是诗歌越来越关注私密的、个人的、内心的、潜意识的、历史性的、多元的区域因素。在这些许许多多发现的背后,进入地域群落诗人所关注的,大多其实就是乡土情感。恰恰是本土本土情怀成为地域诗人诗思飞扬的九层之台的垒土、地基。他们的远方必须是从此在出发的远方,群落诗人的远方也应当是区域及物的远方,是有根的远方,是夹着地方风物起飞的远方,是有烟火气的远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的风景,一个区域的生活,尤其是自带乡土文化调性的生活……这些所蕴含的,不仅仅是风景差异、生活细节的特殊性,同时也凝聚着具体情感的、记忆的、体

验的差异与感受变化。群落诗人的咏唱,特异性恰恰就在这里。他们提供了许许多多不同的乡土风景、风物体验和群落生态情感。日本的柄谷行人认为,风景是被发现的。风景的不同发现,在于发现风景的取景框不同,所谓“取景框”。取景框的尺度、角度、框架,取景人的焦点差异,导致了风景的千差万别、千姿百态。

任何一个远大图景,一定是由许多千差万别的角度、形态各异的焦点等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地域性风景所构成。当然,出于某一个宏大叙事的需要,很多特异的、个别的、私人的角度发现、焦点聚焦,在融合整体叙事的时候,往往被过滤、被剪辑、被重新再编码。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性的、个体性的、特异性的经验和风景,往往被作为杂音、支流或者末流,被省略、被沉默。然而,一旦我们把视野收缩到更内面的层级,这些地方路径的发现,群落野性的乡土风景,便会释放出他们本来被抑制的生机与活力,甚至是热力。

每一个人都有宏大理想的一面,有参与合唱的一面,有集体融合的一面,

有大大小小的共同体认知的一面。这个基本面是“类”的取向,是“种”的制约。此“类”的合唱群体有大小,范围有宽窄。然即便如此,大合唱和小组合唱仍然不同。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独唱,还有独白,还有私语,乃至无语。这种多层次、多层级的思想与情感构造,让每一个人能够相对优裕地保持常态,拥有和谐,能够自我调整,每一天都能以相对更新的面目走向下一个时间节点。地域的诗歌风景,相对于千里江山一揽阔的模式和气象,在气度格局、雄奇瑰玮上固然有所不逮,但在乡土风情、生态气象上却有自有风采和价值。

另一方面,“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艺术自个人出发,有个的特异,但终归要有人“类”的认同与共同情怀。人类共同体意识自觉,其本质就是共存共荣,对他者有包容和谐、平等视之的“仁爱”自觉。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的“类”的自觉,也就是人类共同体的意识自觉。“诗人者,撰人心者也。”无论是哪种形态、场态和生态的诗人,要想有所作为,这种起碼的人类共同体意识自觉,都是应该要有的。文明共识,人类悲悯,这是诗人行稳致远的基本要求,求同是稳的前提,存异则是远的指针。

地方诗歌群也好,群落诗人也罢,都是中国诗歌百花齐放、七彩斑斓的诗歌生态的一部分。写好自己,写好此在,才有彼岸和远方。地域风景与乡土情怀,只有在文化与历史自信的前提下,只有在共同体意识自觉的观照下,才是美美与共,这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才是中国文学应该有的新场态。

## 烽火回望

## 浩气长存小山村

□郑美珊

第一次到山下村,正是细雨绵绵的深秋季节。伫立村口,只见村庄依偎于青岚峰下。山上蒙蒙雨雾中,怪石嶙峋,形态各异。石堆里耸立一大石,形如刀削,犹如一根白色的柱子。因福安方言中“白柱”与“柏柱”谐音,据说这就是柏柱洋名称的由来。白柱石右边有一个石洞,传说与东坑湖相通。石洞有一个房间大小,流水哗哗、寒气侵骨,人不敢深探。石洞周遭,有百丈崖、虎啸崖、文笔洞、合岐洞等,这些崖洞大都是人迹罕至,这给当年的红军战士提供了与敌人周旋的藏身之所。其中有一个石洞,洞口虽小,但洞内幽深,可容纳三四百人,能直通其他石洞,当年,叶飞、曾志、陈挺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将该洞作为藏身之处,躲过敌人的一次次“围剿”,该洞被后人称为“红军洞”。去往“红军洞”,沿途植被茂密,杉松栎栎枫藤杂错,古树虬根匝地,听村人说,这些古树大多已逾400岁。拾级而上,曲径通幽,古树参天,让人流连忘返。

说起山下村,就必须提到“柏柱三杰”——施霖、张少廉、张宝田舍生忘死的革命事迹,以及施霖创作的脍炙人口的《白扇诗》:“一把白扇画牡丹,财主收租大不堪;不管收冬割五谷,一斤半两不让宽……”《白扇诗》在当时的闽东广泛传唱,像进军号角,发动穷苦大众起来革命,像锋利的投枪直刺敌人心脏。今天吟唱《白扇诗》,忆起血与火的救亡时代,耳际仿佛又想起雄浑悲壮的歌声。

施霖,1900年生于柏柱洋头岗村(山下行政村的自然村),1926年考入福州国学专修学校,1932年任中共福安县委委员。1933年10月,他在甘棠组织农民开展“五抗”斗争,参与领导了“甘棠暴动”。同年底,他在霞浦县领导“青蛟暴动”,取得重大胜利。这年,他还与同志们两次缴获敌海军陆战队的一批武器。1935年春,敌人重兵“围剿”苏区。同年

4月19日,施霖与战友张少廉一起被捕,旋即被押送到赛岐新师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利禄引诱,施霖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威武不屈的凛然气节。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在狱中席地而坐,挥笔疾书,写下2万余字,把自己对人民的炽爱、对党的耿耿忠心、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眷恋尽情倾注纸上,连敌人也赞叹:“日试万言,大才无匹。”面对敌人的枪口,慷慨悲歌,引吭高吟:“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头头岗施霖家,仅隔不到两年,痛失三儿女。施依禄,施霖的姑姑,“九家连保”带头人,被捕后,面对敌人的酷刑,坚贞不屈,英勇就义。闽东人民把施依禄誉为刘胡兰式的英雄。施细茄,施霖的胞弟,闽东红带会(赤卫队)总队指导员,在洋中与反动大刀会战斗中壮烈牺牲。一门三忠烈,为革命献出年轻的生命。

“柏柱三杰”中,除了施霖是头头岗人,张少廉、张宝田都是山下村人,他们为了人民的事业,早早地奉献出他们年轻的生命。1935年5月,中共福安县委委员施霖壮烈牺牲,年仅34岁;1935年5月,中共闽东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少廉壮烈牺牲,年仅31岁;1941年2月,中共福安县委委员、凤塘区委书记张宝田壮烈牺牲,年仅42岁。山下村是老一辈革命家叶飞、曾志、陶铸、马立峰、詹如柏等浴血奋战的革命根据地,也是闽东最早的农会组织——福安县柏柱乡农民协会成立的地方,还是闽东第一支革命赤卫队成立的地方,更是保存纪念闽东分田斗争和五抗斗争旧址的地方。山下村作为革命老区基点村,曾经遭受了国民党残酷的“三光”惨劫,山下村人民为革命事业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作出重大的贡献。

如今漫步山下村,只见一马平川,阡陌纵横,眼前40亩荷塘盛开的荷花铺天盖地,红绿相映。



迎着温润的海风,我们走在埭埔村村曲曲弯弯的古巷中,眼前出现一幢幢奇特的房子。房子的形制与传统的闽南红砖房一样,花岗岩的墙基,红砖砌的窗框,与众不同是墙体。墙体灰白,用一块块贝壳形的材料黏合而成。墙面边角峥嵘,锋芒毕露,触感坚硬,凹凸有致。这就是埭埔最有特色的蚵壳厝。蚵壳厝是闽南话,意思是用牡蛎壳建成的房子。

埭埔是泉州著名的渔村,位于晋江入海口,在宋朝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近山识鸟音,近水知鱼性。”埭埔村民以农渔为生,习惯在波底浪尖讨生活。村民驾船出没风波里,捕获满舱鲜活的海产品,到异国他乡兑换成养家糊口的资本。归航时,空船不利于航行,渔民便把他乡遗弃的牡蛎壳装来压舱。载

福州长乐区历史文化随着交通的便利擦开了神秘的面纱,吴航和平街历史文化街区成了网红打卡地。和平街原名东街,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和平街。明清以降,这条通往长乐南北乡的必经之道商铺林立、名脚累世,留下了近百座古建筑和浓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和平街还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千年府第街”。

进入和平街,映入眼帘的第一景就是一段断开的古城墙,看似岌岌可危,以为是尚未完工的工地,不敢靠近。突然发现断墙上雕刻着乌鸦雕塑,地面上密密麻麻刻着的脚印,好似众人马奔走过。我旋即想到修建遗址公园设计者的胆识和创意,艺术家不仅仅局限于修复一段古城墙,而是以艺术形态把长乐的历史文化展示给大家。艺术总有异曲同工之妙。记得世界上曾有让后人浮想、议论的艺术品,例如古希腊雕刻家阿历山德罗斯创作的大理石作品——《米洛斯的维纳斯》。千百年来,人们饶有兴趣地探讨这件艺术品是原先即断臂还是后来损坏的,甚至有人设想接上手臂后会是什么效果。同样,假如完整

## 诗路花语

## 井冈诗行

(组诗)

□念琪

黄洋界

一个伟人魂牵梦萦的高度  
不管是西江月、水调歌头还是念奴娇  
都传出黄洋界三声炮响  
从此,底气升腾起来了

一个黄埔校长的噩梦之谷  
黄梁美梦被轻易粉碎  
阴阳交界。从此  
一堂军校的精品课  
精彩回放让反动派瑟瑟发抖

悬崖之上,杜鹃花风展红旗如画  
那条羊肠小道被挑粮的汗水  
打磨得精光灿烂  
两条扁担在歌谣中久久传唱

井冈山会师

两只巨手紧紧握住隆隆炮声  
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  
汇合成井冈山奔流

## 心灵驿站

## 风中的牡蛎

□王继峰

回家的牡蛎壳硕大坚硬,精明的埭埔人充分利用,加工成极佳的建材。海底的生灵和陆上的沃土结合,便成了坚实的墙体。埭埔俗语有云:“千年砖,万年蚵。”这种用有生命的材质建成的房子冬暖夏凉,坚固耐用,是埭埔村风行数百年的传统建筑,是大海对她所宠爱的

子民的丰厚馈赠。

风从海边吹来,故乡的气息瞬间把沉睡百年的生灵激活。牡蛎壳排列得井然有序,仿佛层层鳞浪在海面闪烁银光。蚵壳厝像是搏击浪涛的渔船,无论风浪如何汹涌,它们总能保证主人的安全和舒适。牡蛎是至刚至柔的结合,最坚硬

从农村包围城市  
龙江书院书声琅琅  
改变了中国命运  
三湾改编,将军的摇篮  
和井冈山的毛竹一起成长

在朱毛爽朗笑声中  
记取何长工、袁文才、王佐  
他们镌刻在时空忙碌的身影  
和被忽略的重量

拜谒井冈山纪念馆

一百年轮回的杜鹃花开时节  
一行人来凭吊古人  
——他们的热血正义  
用发自内心的仪式感  
告慰在天之灵  
在墙壁的图片上寻找  
那些熟悉的青春面孔  
看看他们哪几个已经投胎入间  
为今日之复兴,再洒热血

八角楼

在祠堂的掩护下  
夜幕中亮起北斗七星  
书房里端详八角天窗  
  
讨粮、天问、答复  
共同研判天下苍生  
何去何从的密码

灯光辉映星光  
呼应天上人寰  
那一只大碗  
在倾听黎明天狗的呼唤

的外表包裹最柔软的心灵。眼前的牡蛎壳虽然早在千百年前就被掏空身子,但我却依然能感受到它们澎湃的生命。它们以另一种方式永生,用刚强撑起大厦,撑起村庄,成为渔民最坚实的后盾。

在飞速发展的社会,这种农渔时代的传统建筑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大家纷纷迁入便利舒适的洋房。没有人气,老房子,只能在时光中颓圮。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将它珍藏在影像中,定格在记忆中。

流连许久之后,我们离开埭埔村。行至晋江的入海口时,大风灌得满车都是大海的气息。潮水涨起,波浪汹涌,涛声震天。海风从蚵壳厝的方向吹来,从我的脸颊划过,耳畔又响起牡蛎的鸣叫。鸣声越来越大,一声紧接一声,竟然和涛声同一种音质,同一个节奏。

## 游目骋怀

## 断墙

□宫金水

地修复吴航古城墙,甚至再插上古香古色的旗帜迎风猎猎,你或许会感觉气势恢宏,热热闹闹,然而修复的古城墙沉陷于千篇一律,其坎坷的前世今生就湮灭在你漫不经心的脚下,平平如也。

因了断墙的艺术效果,给我留下一个历史问号,让我渴望解读断墙的前世今生。我认真阅读吴航古城遗址公园的碑文,看到眼前残缺的古城墙雕刻着吴航古城时代的变迁,地面上杂乱的脚印突显古城曾经络绎不绝的辉煌,那黑色乌鸦雕塑似乎在诉说吴航古城曾经的不易。悲乎喜乎,断墙为世人刻画了吴航古城的春秋史话。

看似静默的墙址,掩埋着刀光剑影和历史烟尘,一幕幕,一场场,前仆后继,令后来人惊心动魄。长乐建县始于唐武德六年(623年),上元元年(760年)由古槐镇迁至吴航镇六平山,此间700多年长乐无城无隍,原生态的民间细雨轻风。明弘治庚戌年(1490年)为防倭寇入侵,长乐县建了城门、城墙与城隍。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袭扰,长乐拓城,奋勇抗敌。直至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长乐古城形成山水环绕,“城内有水”“城外有池”“大小舟航皆可入城”的独特风貌。1928年后,国民政府拓城,拆除部分城墙扩建马路。抗战爆发后,一时众志成城。为防日寇舰艇侵入闽江,拆除了城墙石墩堵航。新中国成立后,长乐政府利用城墙基础建设了东关街通往奎桥的简易公路。20世纪70年代末,简易公路又改造为水泥公路。80年代中期,人们意气风发,加大建设,公路两边拓展新楼,一时通衢大道面貌一新,长乐吴航古城墙基几乎湮没。

抱着敬仰的心情,我欣赏这看似无声胜有声的断墙设计,它犹如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的引子,让我慢慢地去细品历史沧桑。

